

亨利·詹姆斯《金碗》中玛吉的平衡意识

唐 静¹, 王 楠²

(1.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达州 635000;

2.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亨利·詹姆斯的著名小说《金碗》中, 主要人物玛吉·韦维尔总是在一种平衡意识的支配下活动。她在人物关系中建立并维持一种平衡, 以求达到力量对等, 由此主导了小说情节发展。直到一个符合社会标准和人物期望的平衡关系形成, 持久的幸福才得以实现。通过运用结构主义诗学分析人物关系中力量分布的变化, 解密玛吉的平衡意识, 从而挖掘文本之下潜藏的詹姆斯的平衡观。

关键词: 亨利·詹姆斯; 《金碗》; 平衡; 结构主义; 人物关系; 格雷马斯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8)04-0340-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8.04.007

Maggie's Idea of Equilibrium in Henry James's *The Golden Bowl*

Tang Jing¹, Wang Na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Golden Bowl* by Henry James, the main character Maggie Verver always acts on the idea of equilibrium. She tends to set up and maintain a balance within relations of characters like weighing with a scale, in this way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rue and durable happiness is finally obtained when a balanced relation is formed both following social norms and answering characters' desir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s i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framework of structuralism, Maggie's idea of equilibrium is deciphered, and thus the underlying Jamesian belief of equilibrium is explored.

Keywords: Henry James; *The Golden Bowl*; equilibrium; structuralism; relations of characters; Greimas

《金碗》的作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 自幼随家人游历欧洲, 往来于欧美大陆, 非常赞赏欧洲文明, 也受到很大影响。1915年因不满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 愤而加入英国国籍, 死后又葬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他是著名的小说家

和文学批评家, 是英美文学从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向20世纪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开拓者, 开创了以意识流为标志的心理小说的新纪元, 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英国作家E·M·福斯特、D·H·劳伦斯、约瑟夫·康拉德等和美国作家伊迪丝·华顿、威廉·福克纳等都产生

收稿日期: 2016-11-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18YJA752014)

作者简介: 唐 静(1991-), 女, 助教。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E-mail: tangjing5352@163.com

了影响。詹姆斯一生除剧本、游记和评论文章外,还创作了22部长篇小说和113个中短篇故事,其中较知名的有:《黛茜·米勒》(*Daisy Miller*),《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大使》(*The Ambassadors*)和《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詹姆斯以对人物细腻的心理描写而著称,作品主要涉及美国和美国人与欧洲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美国的无辜单纯与欧洲的世故诡谲的对立等主题。但因其作品多数过于冗长,内容艰涩难读,他在生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其著作才蜚声世界文坛。国内对其作品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

《金碗》(*The Golden Bowl*, 1904)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自出版后评论就褒贬不一,既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詹姆斯晚期作品的败笔,也有推崇者认为是他精湛技巧的又一次展现。但相对于詹姆斯的其他名作而言,《金碗》受到的关注很少,国内更甚,至今没有中文译本。小说主要记叙了富商亚当(Adam)相依为命的女儿玛吉(Maggie)即将与没落贵族亚美利戈(Amerigo)结为连理,婚礼前夕,亚美利戈却与旧爱夏洛特(Charlotte)重逢,而玛吉并不知晓二人的关系。婚后,为了抚慰落单的父亲,玛吉说服他迎娶了好友夏洛特。但玛吉和父亲在婚后依然保持着异常亲密的关系,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也很快旧情复燃发生婚外情。因玛吉阴差阳错买下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舍弃的带有瑕疵的金碗,他们的地下情暴露。但看似天真无邪的玛吉却毫不表露她已知情并暗下计谋拆散他们。小说以亚当带着夏洛特前往美国、亚美利戈向玛吉表白爱意结尾。

小说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亚美利戈角度描写,第二部分从玛吉角度描写。小说主要人物不多,关系网亦不大,但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转换却极具戏剧性又复杂多变。以往学界的研究专注于探究小说的叙事手法,如陈丽的文章《亨利·詹姆斯〈金碗〉的元小说性》、王丽亚的《聚焦折射下的人际关系——亨利·詹姆斯〈金碗〉聚焦模式评析》以及陈秋红的《秘响旁通:亨利·詹姆斯〈金碗〉隐喻的诗学品质探识》等;另一研究焦点则是小说的内容及主题,如王珊的文章《亨利·詹姆斯的〈金碗〉:婚姻的寓言》和朱细燕的《论〈金碗〉中的道德失范》等。但小说人物间的关系转换也很值得探讨,本文认为,是玛吉主导了关系变化,小说的情节发展也是围绕着天平晃

动般的人物关系展开戏剧性且微妙的变化。小说以玛吉和亚当父女相依为命的平衡关系展开,在玛吉与亚美利戈结婚后平衡被打破,而后亚当与夏洛特的婚姻使四人之间恢复平衡关系,但这期间父女间夫妻般的亲密关系、继母与女婿间的婚外情使得四人形成的乱伦平衡很快崩塌,在经历情节发展后小说最终以两对夫妻形成的平衡关系结束。

在《金碗》中,“平衡”(equilibrium)一词在文中出现多达11次,足见其重要性,平衡意识(the idea of equilibrium)在此文本语境中可以视作维持关系的对等与相互抗衡的意识。小说以玛吉的平衡意识为轴心,在亚当的配合下引导人物关系的转换,这些转换构成了文本的内部结构和小说的主体骨架。本文剖析玛吉平衡意识下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的意图恰与现代批评方法——结构主义相契合。

兴起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结构主义由最初语言学领域逐渐发展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注重整体模式研究,主张从逻辑语义层面对文本进行解读,为挖掘文本深层意义提供了有效手段。不同于传统文论如精神分析等需借助外在因素来分析文学文本,结构主义更关注文本本身的内在结构。结构主义认为文学作品的本质不在于各要素本身,而在于构成整体结构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1]183},任何个体只有置之于整个大结构中,与其他主体相互关照,才能实现自身的意义。并且结构主义文论家把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的,深层结构则是潜藏在作品中的模式,必须用抽象的手段把模式找出来”^{[1]184}。本文遂利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文本的深层结构,剖析人物表面关系之下的整体结构,即主要人物玛吉、亚当、亚美利戈、夏洛特之间的等式关系及普林奇皮诺(Principino)和凡妮(Fanny)的支点作用,并运用著名结构主义者A·J·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的代表性理论——符号矩阵模式来分析以上主要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得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变换是在玛吉的平衡意识主导下实现的。

一、玛吉、亚当、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之间的等式关系

结构主义被定义为:“1)结构应是一个由各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此种转换不是在体系的领域

之外完成,而是在不求助外界因素的情况下在体系内完成;2)体系能自我守恒,本身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自我调节性三个特点;3)结构的普遍性、必然性应能达到‘可以形式化’(公式化)的程度,甚至可以直接用数理逻辑方程式表达出来。凡具有上述理论特征的派别、方法、活动,都可称为结构主义。”^{[2]105}《金碗》中体现玛吉平衡意识的人物关系变化正符合上述特征,它是一个内在的独立的关系体系,具有整体性,并不断转换调整,在公式化后更加清晰明了。

(一) 短暂平衡:“玛吉 = 亚当”

玛吉的母亲在她10岁时就已过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实际上,他们的亲密已经超越了父女关系,而更像夫妻关系。这一点玛吉自己也意识到了,她对父亲说:“好像我和你要是结婚了,你就不能在婚姻市场找机会了,倒不如说,好像因为我和你结婚了,其他人因为我都不敢接近你了,我并非故意的。”^{[3]101}也正因此亚当一直没能续弦。但此时两人的关系就像天平的两端处于平衡稳定的关系。

只要他们的关系天平没有倾斜,他们就能一直这样幸福。正如德莱顿(Dryden)所说的那样,“‘平衡’是《金碗》这个流动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状态,这种‘幸福的平衡’使得社会形态可以维持稳定的表象”^[4]。确保人物处于平衡状态在小说所处的世界中很关键,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人物才能获得幸福。玛吉也深知并在小说中践行了这一点。例如,当玛吉需要做决定时,她想着“选择和决定还包含其它方面……一种一直存在的在意,其中就包含平衡”^{[3]244}。她也知道“她的任何表现都会多多少少直接传达给她父亲,父亲的生活太平静了,任何一点意识的变化,即使是能带来生机的那种,也会动摇他们宝贵的平衡。这种想法一直在她心底,她觉得他们的平衡就是一切,而这平衡又很难维持,失掉它就像扯断一根头发那么轻易。正是这种平衡,或者说那种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平衡的信念使她提心吊胆”^{[3]241-242}。玛吉之所以成为小说情节扭转的主要推手正是因为她有强烈的维持平衡的信念,玛吉时刻将这个平衡谨记在心,做任何决定都要将其考虑在内,也因为玛吉和亚当像天平两端,任何一边的行动都必然会影响到另一边进而打破平衡,所以玛吉总小心翼翼行事,想尽办法以维持这脆弱的平衡。

(二) 失去平衡:“玛吉 + 亚美利戈 > 亚当”

虽然玛吉和亚当父女俩互相陪伴过得很幸福,但社会习俗不允许他们不正常的父女关系继续。逐渐长大成人的玛吉应该嫁做人妻。所以这时凡妮介绍了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亚美利戈。亚美利戈帅气又聪明,更重要的是,他是有显赫家世背景的“王子”。亚当虽然是个大富豪,但他缺少体面的身份背景。这样的情况在詹姆斯写作此书时很普遍,美国在1865年内战后经济迅速发展,财富积累后必然是对身份名誉的追求,所以“19世纪末正盛行将富裕的美国女儿嫁入欧洲上层阶级的文化潮流”^{[5]153},鲍勃(Bob)和凡妮的联姻就是一个例子。亚美利戈虽然家道中落,但他始终“属于一个很有名的阶层”^{[3]7},玛吉也在一次与他的谈话中坦承“最初让我想到你的原因……就是你背后的世世代代”^{[3]7},如凡妮对丈夫所说“玛吉刚好在别人跟他打招呼时知道了……王子的一个洗礼名……叫亚美利戈——这个人是个勇敢的先驱,大约四百年前,他跟随哥伦布漂洋过海,后来接替哥伦布发现并命名了新大陆,所以到现在他能扯上关系的人依然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仰望”^{[3]47},由此可见亚美利戈有足够好的家世背景,而玛吉也非常清楚他的价值,与亚美利戈结婚不仅可以让她和亚当免受非议,还能增添门第荣耀,这场联姻如鱼得水。但亚美利戈与玛吉的结合打破了原有的玛吉和亚当一比一持平的关系,天平一端的夫妻俩重于另一端孤独的亚当。

(三) 阴谋平衡:“玛吉 + 亚美利戈 = 亚当 + 夏洛特”

玛吉婚后形成的这种倾斜关系无疑违背了她的平衡意识。这场婚姻虽然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没能带给他们快乐的生活。玛吉曾向亚当表达歉疚:“因为我嫁给了其他人,导致你孑身一人。”^{[3]101}于是玛吉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为亚当也筹划一桩婚姻。她选择了旧友夏洛特。不仅因为她“本性善良、性格好、精神品质佳,还是个生活能手”,可以让这个家“更体面”^{[3]105},更因为娶她进门可以恢复关系的平衡。正如文中所述:“这次联姻带来的最大发现就是夏洛特本来就在他们的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娶她根本就是仆人们口中所说的多此一举,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很难接受一个事实,即如果他们的家庭这辆马车前行困难,那就是因为缺

了一个轮子。他们可能会说,他们已经有三个轮子了,还需要一个,夏洛特从一开始除了像第四个轮子一样出色地行事还做了别的吗?”^{[3]245}他们四人组成的新家庭本就是注定的,夏洛特这第四个轮子的加入才能使关系达到平衡,家庭这辆马车才能运行良好,生活才会幸福。

然而,这一平衡在形成之初就注定不稳固,因为四位成员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结婚的动机都不是爱而是利益,所以都不甘心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对玛吉和亚当而言,除了上述亚美利戈和夏洛特的可利用之处,这两桩婚姻还可以方便他们像往常一样一样亲密。各自结婚后,他们独处的时间较之前并未减少。“这两桩婚姻使她可以和父亲依旧那么亲密,她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比和那位王子多。”^[6]除此之外,把亚美利戈纳入他们的家庭就像新买一个物件,玛吉就曾对亚美利戈说:“你就是他[亚当]收藏的一部分。”^{[3]8}所以玛吉根本不会像妻子对丈夫那样在意亚美利戈的感受,她甚至对亚当说:“亚美利戈不介意……我们的所做作为。”^{[3]103}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一起。亚当对这两位新成员也没有太多感情,他只是“给女儿玛吉买了一个丈夫”^{[7]385},他还“把夏洛特买来做妻子”^{[7]386}。这两桩婚姻就好像给家里买了两件家具,玛吉和亚当的生活不但没有受影响,两人反而藉此变得更亲密。

(四) 乱伦平衡:“玛吉 + 亚当 = 亚美利戈 + 夏洛特”

正当玛吉和亚当亲密无比时,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也旧情复燃。这对旧相好曾因缺钱而被迫分开。夏洛特来伦敦的目的就是见他。亚当向她求婚时促使她答应的一点就是以后可以更多地和亚美利戈接触。婚后她也确实颇为主动地接近亚美利戈。亚当的财富自然也是一大吸引力,正如她对亚当所说:“如果我这一生……哪怕有你所拥有的一小部分,我就没有忧愁了。”^{[3]139}若她有哪怕亚当的一小部分那么富,他们就不会是对苦命鸳鸯。嫁给亚当的另一好处就是可以赢玛吉这个情敌一次,当亚当告诉她玛吉会来为他当说客时,“这就是终于令她满意的一点”^{[3]132}。抢走情人的玛吉要谦卑恭敬地来请求她嫁给亚当,也算扳回一局。而对亚美利戈而言,他加入的原因无疑就是岳父的财富了。他“渴望创造新的历史……创造的材料就是韦维尔先生的财富。这世上没有别的供他利用了,他已经试

过了”^{[3]11},他知道现在唯一可以帮助他实现抱负的就是亚当的财富。

当玛吉和亚当利用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之时,他们也反过来被利用。如菲普斯(Phipps)所说,“通过为父亲寻找伴侣,玛吉在家人中维持着平衡,而夏洛特和亚美利戈又与此同时追求着他们的关系”^[8]。玛吉在操纵着关系的平衡,可被操纵者又偷偷实施着他们的计谋。“韦维尔的新财富和王子的旧贵族的结盟一开始就是双向增值,双方都在利用另一方。夏洛特被收藏来增加社会魅力和王子因其美学价值而被收藏是一样的。”^{[5]153}所以,两桩婚姻形成的平衡因四人各自的阴谋在形成时就崩塌了,而随后新形成的平衡也是脆弱的,因为父女间的夫妻般关系、继母与女婿的婚外情都不符合社会伦理。虽然对玛吉而言,很幸运“尽管经过调整,力量分布呈现新变化,但平衡坚持住了取得了胜利,平衡这一最宝贵的状态得以维持”^{[3]274},但这平衡是不健康的,因此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家庭始终不能幸福。

(五) 平衡的支点:普林奇皮诺和凡妮

在上述力量分布变化的同时,另一个不平衡形成:玛吉和亚美利戈的儿子——普林奇皮诺的出生使得天平一端的一家三口重于另一端的亚当加上夏洛特。所以当玛吉看着她父亲和儿子在玩耍时,她想,“要是夏洛特也给他生了一个普林奇皮诺的话,平衡是否就只会像现在这样真实,就不需要最奇怪的研究了”^{[3]289}。可夏洛特不会如玛吉所想的那样做,因为她知道“可能我要生十多个孩子,假设我可以的话,才能把这对鸳鸯分开吧”^{[3]177}。所以玛吉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让普林奇皮诺同属于亚美利戈和亚当。虽然亚美利戈是生父,但亚当和他共处的时间更多,角色上更像父亲。尽管“可爱的小孩会成为夫妇间新的纽带,但玛吉和她父亲却机智地将这个小东西变成了妈妈和外公之间的纽带”^{[3]91}。因此,普林奇皮诺像支点一样调节着天平两端的力量,维持着两个家庭间的平衡。

另一个起同样作用的人物是凡妮。她似乎一直很清楚两边的关系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她说自己“是一个双面染色的驴子”^{[3]226}。而亚美利戈似乎也知道凡妮的作用,他和夏洛特谈到她时曾说:“她会为我们做任何事的……但她也会为他们[玛吉和亚当]做任何事。”^{[3]178}而凡妮这么做,只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看别人受苦时将自己的美德、

同情心、无私、敏感都展现出来”^{[3]307}。也正因为她两边都想帮，才会有天平的晃动。一开始，她站在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这边。她将亚美利戈介绍给富千金玛吉，以帮助他获得梦寐以求的财富。正如她对丈夫所说，“他们可能没发现我决心为王子服务的动机，无论何事，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他舒服，换句话说就是让他得到他想要的钱”^{[3]306}。而后，她又帮助夏洛特和亚美利戈重逢，故意借故离开“以给两位来访者自由空间”^{[3]29}，他们这才得以再续前缘。凡妮不仅向玛吉隐瞒了他们是旧情人的事实，还帮忙隐瞒婚外情。当玛吉察觉到异常向她证实时，她否认说玛吉这怀疑很荒谬，并进一步安抚她：“他绝对不会伤害你一根寒毛的……我敢肯定夏洛特也不会。”^{[3]298}凡妮不仅帮亚美利戈获得了财富，还“让他可以同时享有两位美女”^{[3]307}；她也帮夏洛特得到了财富，并得以再续旧情。也是她促使亚美利戈和夏洛特站到了天平的另一端对抗玛吉和亚当。

而当玛吉意图纠正这畸形的平衡关系时，她也向凡妮求助，因为“阿森罕夫人似乎可以减轻她对夏洛特的紧张感。似乎两者可以平衡，互相对峙，似乎她的平衡意识又浮现了。就好像把她的朋友放入她的天平中做法码，这天平就是她和父亲建构的。亚美利戈和夏洛特就是天平另一端，所以需要他们三个人的力量来使天平恢复平衡”^{[3]288}。玛吉要借助凡妮的力量来恢复正确的平衡关系，使亚美利戈和夏洛特回到应该的位置。她向凡妮求助：“亲爱的，你知道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帮我了。”^{[3]290}而凡妮也答应“力挺她到底”^{[3]304}，因为她有愧于玛吉和亚当，她对丈夫说：“我相信如果他[亚当]知情的话他会放过我的，所以我要帮他。或者不如……我努力帮助玛吉吧。”^{[3]308}凡妮为玛吉争取时间让她试探丈夫和继母是否真的有染，并帮玛吉隐瞒她对这件事的知情度以迷惑亚美利戈和夏洛特，让他自己在两个女人间做选择。最终，玛吉赢回了丈夫，亚美利戈向她表白爱意：“我眼里只有你。”^{[3]443}她借助凡妮又一次打败了夏洛特，她和丈夫“在一起了，他和她，很近，很近，而夏洛特尽管在她面前光鲜亮丽，却跌入了某个黑暗的空间，在那里孤独将她包围，无法挣脱”^{[3]376}。

(六) 合理平衡：“玛吉 + 亚美利戈 = 亚当 + 夏洛特”

尽管始于相互利用，玛吉和亚美利戈最后是因

为爱才选择继续在一起。玛吉曾坦承，“在她了解了他的那一刻，她发现自己从未如此仰慕他，或发现他如此英俊、聪颖、魅力无限，就像她见过的其他女人沦为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旦开始就深入体内”^{[3]96}。她和其他坠入爱河的女人一样深深地迷恋着她的爱人。而且她发现他们心有灵犀。当她担心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她“在和亚美利戈的相视无言中看到了同样的害怕……她丈夫类似的操心的习惯和一贯的谨慎只会将他们拉得更近……她很高兴他们有相似的感觉”^{[3]242}。玛吉对亚美利戈的爱甚至深到愿意为他而牺牲父亲。亚当曾问她会为了什么而牺牲他，而他知道“她会崩溃地说出亚美利戈这个名字”^{[3]386}。亚当也甘愿为女儿的幸福做出牺牲，“他实际上是主动献身的，把自己像个祭品一样压向她”^{[3]387}。他选择离开女儿去遥远的美国，和妻子好好生活，也给女儿女婿以空间。而对夏洛特而言，她和丈夫之间的阻碍也终于被清除了，她因此有机会“至少可以小部分地占有他”^{[3]414}。小说结尾，亚美利戈和玛吉越来越相爱，夏洛特也和亚当远行美国，一起经营生意过着不错的日子。每个人都处在了满意的位置上，而这一新的平衡是经历调整后符合社会伦理的、稳固的平衡。

二、玛吉、亚当、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之间的矩阵二元对立关系

主要人物间的关系变换也可以从结构主义另一角度——符号矩阵来分析。A. J. 格雷马斯是结构主义学家的代表之一，因其提出的叙事分析理论在阐释文学文本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革新意义而被称为文学理论家。格雷马斯在二元对立原则的基础上，借鉴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理论，发展了他先前提出的“行动元模型”(modèle actantiel)理论，提出了完全形式化、符号化的矩阵。所谓二元对立，就是“把研究对象分为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有联系的、排列的、转换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9]。“在二项对立中，只要某项具有肯定的特征，另一项就会认为具有否定的特征。”^{[2]111}“在文学批评方面，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semiotic square)被认为是文学理论中形式化程度比较高的范例之一。”^{[2]181}

格雷马斯认为,在没有任何语义投入的情况下,若“一个意义 S 在初次被人把握的水平上以语义轴的形式显现”,那么必然存在它的对立面 $\bar{S}$ 。若我们同意 S “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着两个相反的义素: S_1 和 S_2 ,那这两个义素就必然会有与它们各自相矛盾的对立项: S_1^- 和 S_2^- ”^[10]。由此,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便能表达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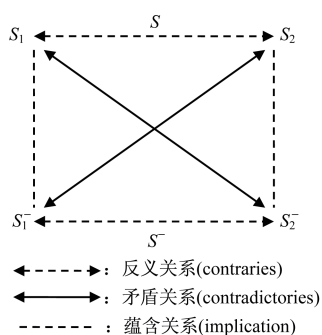


图1 基本符号学矩阵
Fig. 1 Basic semiotic square

以此符号矩阵来解读《金碗》则可表示为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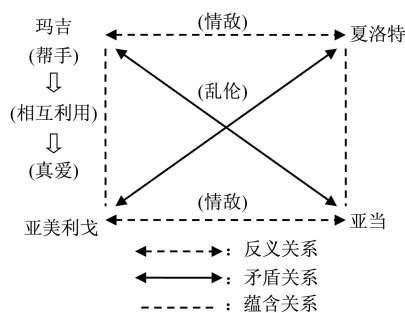


图2 文本中符号学矩阵
Fig. 2 Semiotic square in the text

在图2的文本共时结构中,行动元(actant)^①之间关系的形成同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社会伦理的约束使得玛吉和亚当亲如夫妻的关系不能继续,玛吉与亚当处于矛盾对立关系。这一关系也是最基本的对立关系,是文本的第一推动力,后续关系皆由此衍生。同样,亚美利戈和夏洛特也因女婿与继母的关系而被社会伦理置于矛盾对立面。

玛吉和夏洛特、亚美利戈和亚当互为情敌关系,“情敌”这一至关重要的叙事代码使得他们处于对立关系。而这一反义关系的对立程度深于上述矛盾关系,前者是主动选择的,后者是被动接受的。

行动元之间的蕴含关系较之另两组关系更为隐性也更复杂。亚美利戈与玛吉结婚,故在逻辑矩阵

上关系密切。表面看,他是被玛吉和亚当利用,成为他们维持亲密关系、提升社会地位的“帮手”,此时他们处于“从属关系”。但随着进一步的阅读,读者会发现亚美利戈其实是打着自己的算盘反过来利用了玛吉和亚当,既获得了财富,又得以与旧相好复合,此时他们的关系转化为互相利用的“对立关系”。而随着情节继续发展,亚美利戈又与玛吉产生真爱,最后形成了“最亲密的关系”,甚至超越了最初玛吉与亚当间的亲密。夏洛特与亚当的关系也属于同一模式。而普林奇皮诺和凡妮看似没有直接出现在这一关系矩阵中,实则充当的是矩阵中尤其是蕴含关系中影响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先前的“行动元模型”还是后来更加形式化的“符号矩阵”,格雷马斯的叙事理论都代表了结构主义者的一个主流观点,即人物从属于情节,叙述中的“行动”才是核心。运用符号矩阵不仅可以帮助分析出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发现主导关系变化的人物行动,进而推断出指导人物行动的心理意识。由此,利用上述符号矩阵分析可以得出:小说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在玛吉的平衡意识操作下不断变换的,最终形成了合理的因而持久的二元对立、相互制衡关系。但析出叙事模式的意义不仅限于逻辑语义层面,还可以进而对文本主题、行动元心理等进行考察。玛吉这个主要行动元的平衡意识即是强烈的想要维持力量对等的冲力,在实现合理的关系制衡之后,也就随之实现了家庭、社会的和谐幸福。

三、结束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开始时是为了解决一对X与Y的矛盾,但却由此派生引发出大量新的逻辑可能性,而当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了以后,便有了封闭的感觉,故事也就完了。”^[11]由玛吉和亚当的矛盾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人物关系在所有人回归本位后画上圆满句号。从文本来看,玛吉最后还是和父亲分开了,但在亚当的配合下她的平衡意识得以以最合理的形式实现,他们既保持着亲密的父女情,也各自拥有了幸福婚姻。亚当曾在和夏洛特出发去美国前去看望玛吉,两人既是在道别也是在

① 有“行动位”“角色”“行动素”“行动单位”及“行动者”等其它多种译法,指参与过程的人或作为谓语之主语的事物。

总结,“她把手放在他肩上,他们眼神再次相对,因为这持久的幸福,他们都淡淡地笑了,仿佛言语已经无法表达……他们找到了他们的联系,就像故交不必总见面,情谊不会改变”^{[3]438}。虽然因为要实现平衡做出牺牲,玛吉与父亲不得不分隔两岸,但他们始终像是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即将迎来通过玛吉费心维持平衡而得来的幸福。詹姆斯也借此表达了他对“平衡”一贯的信念。这个跨大西洋两岸、生活及文风都颇难定性的作家追求的或许也就是一种平衡。正如广泛存在于其作品中的“国际性主题”之意义,詹姆斯在作品中展现了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单纯与世故之间的对立^{[12]203},进而表达了对欧美文化融合的希望^[13],希望借鉴深厚的欧洲文化,在美国的新生文化中实现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平衡。詹姆斯也推崇在小说中实现美学和道德的平衡,认为只有当作者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时才能实现创作目的——即作品包含美和真的本质^[14],另一方面,“只有当作品具有赏心悦目的美学价值时,道德观念才能得以成功表现”^{[12]202}。詹姆斯也在《金碗》中成功实践了他的平衡美学观,《金碗》既是实现文化平衡的一次尝试,也是实现美学作品与道德观念平衡的一次试验。《金碗》虽然后来被公认为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笔,但在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被大众接受,因为其文风与当时马克·吐温等作家代表的通俗主流格格不入。这部精湛的美学作品也成功地表现了道德观念,玛吉主导这一系列关系变化实际都是为了维护婚姻和家庭,最后四位主要人物都获得了符合社会伦理的幸福,这样的结局证明她的行为其实是符合社会道德观的。无论是一些反对者提出的《金碗》文字晦涩的弊端,还是描写局限于个别人物等不足,其实细致分析后不难发现正是作者实践自己文艺理论的用意所在。

参考文献:

[1]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5.

- [2] 李广仓.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 [3] James H. The Golden Bowl[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5.
- [4] Dryden E. The imp of the perverse: metaphor in *The Golden Bowl*[J]. Henry James Review,2010,31(2):111-124.
- [5] Hutchison H. Seeing and Believing: Henry James and the Spiritual World[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6] Brown B. Jamesian Matter[M] // Zacharias G W. A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292-308.
- [7] Gard R. Henry James: The Critical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8.
- [8] Phipps G A. Desire, death, and women in the master-slave dialectic: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nd Henry James's *The Golden Bowl*[J].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2011. 35(2):233-250.
- [9]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0] 格雷马斯 A J. 符号学约束规则之戏法[M] // 格雷马斯 A J.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 吴泓缈,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139-161.
- [11] 杰姆逊.文化研究——叙事分析[M] //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03-140.
- [12] 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13] 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J]. 外国文学评论,2000(1):52-61.
- [14] Henry J. The Art of Fiction[M] // Shapira M. Henry James: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Westport: Greenwood University Press, Inc,1978:49-67.

(编辑: 巩红晓)